

开展农村社会主义 大辩论的经验

王成旺等著

通俗读物出版社

目 录

“灯不拨不明，話不說不透·····	
·····中共榆次地委書記 王成旺（2）	
必須相信群众，必須加强领导·····	
·····新华社記者整理改写（13）	
关于合作社的思想政治工作問題·····	
·····中共山西省委書記 王 謙（20）	

“灯不拨不明，話不說不透”

山西省榆次县曙光农业社开展社会主义思想宣傳运动的經驗

中共榆次地委書記 王成旺

不久以前，我帶一个工作組到榆次县張庆乡曙光农业社进行了社会主义思想宣傳运动的試点工作。

曙光社在榆次专区來說，是一个办得比較好的社。去年虽因遭灾減产，每个劳动日还分到一元二角錢，每口人实际平均分粮四百四十七斤，分粮最少的五保戶也分到三百八十斤。去冬整党整社工作做的不錯。社干能力不弱，作风一般也好，社員都还贊成。我們去的时候，看来农民生产情緒也是好的，計劃訂出来了，包工包产也到队了，群众对这很滿意。乍看起来，好象没有什么問題。因此，我們曾經想过，这个地方也許不是我們进行試点工作的理想对象。

一、把思想的底子摸透

后来想，既然来了，了解一下群众的思想情况也是好的，从調查研究中也許能发现一些問題。于是，我們召集了一系列的座談会，包括富裕中农戶座談会，人口多、劳动力少、生活困难的一些戶的座談会，青年座談会，最后开了个全体党团员座談会。在这些座談会上，特别是在党团员座談会上，我

們发现了农民思想上还有一些重大問題：一部分人的劳动积极性不高；不少青年男女不安心在农村生产。具体情况怎样呢？

那些人劳动积极性不高

一、人口多、劳动力少、生活有困难的戶。这个社一个劳动力养活五口者占总戶数的23.8%，占总人口36.4%，六口以上者，占总戶数13.6%，占总人口13.3%。其中，原属貧农下中农的戶，他們是积极的要劳动的，但是由于終年辛苦劳动，生活比別人还是不好，因而在精神上不够愉快。他們的說法是：“社会主义好是好，就是人口多，劳力少的人过不好。”至于这一类戶中原属富裕中农的戶，由于入社后，收入减少，情緒就更坏了。

二、有劳力或劳力多、人口少、家庭累贅不大、收入多、生活好的戶。由于入社后实行按劳取酬了，收入比过去大大增加，按說劳动是應該积极的，大部也确是这样，但也有問題。他們中有两种人不太积极，一种人感到錢虽多，但不能随意买到需要的东西。另一种是单身汉，他們的婚姻問題得不到解决，感到个人生活前途暗淡，所以劳动劲头不大。

三、收入沒减少的富裕中农，也沒有单干时积极。他們来自发思想很严重，省吃儉用积极劳动經營，置土地、拴胶輪大車，想发展成富农。他們起初是三社（农业、供銷、信用）不入。現在的說法是：“我們在社不在社一样，收入沒减少，出了社也不能买牲口，置土地，雇长工。”言外之意是对不能发展資本主义有些失望。这一种戶和减少收入的富裕中农户都以为他們入社是吃亏的。不过，前一种表現是比过去收入少；

后一种表现是大財不能发了。他們都認為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原来沒有生产資料的，或者生产資料少的，現在凭勞力把他們的油水分走了。他們的說法是：“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笑的拉哭的，哭的拉笑的，生活太好了不行，生活不好的大家补一补，都活的差不多就行啦。”

四、張庆妇女，过去是沒有上地习惯的。解放以来，这种情况有改变，特别是高級合作化以后，为了多得劳动日，出勤率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但思想落后于实践，認為农业劳动太苦，甚至編些顺口溜形容說：“妇女提高一尺，晒的墨黑，提高一丈，就上不了炕。”

什么人不安心在农村生产

青年不安心农业生产是一个严重問題，他們面向城市，想办法往城里流。农民們認為城里“生活好，劳动輕”，因此，总想把他們的子女弄进城里。張庆本村有个完小，有个“戴帽”中学，女生的比例超过男生，有些女孩子公然表示：住中学不一定要升学，毕了业能找个工作固然好，不能的話，也有了嫁給城里人的条件了。有人說媒的話，她們的态度是：“是工人，愿意；是干部，可以商議；是农民，趁早不要来，免得我动了脾气。”我們做了个統計：1955年至1956年出嫁姑娘五十七个，有三十六个嫁到了城里，其中嫁給工人的二十三人，嫁給干部的九人，嫁給教職員的四人，嫁到农村的二十一人，但只有两个是嫁給农民的，十九个是嫁給复員軍人的。嫁給复員軍人当然是好事，但是有些姑娘这样做是看見复員軍人有錢，复員軍人有优先参加工作的权利，能想办法流进城里。

男青年本来就不安心在农村，在婚姻問題上又来了个火上

加油，因此他們也想尽办法往城里流。有一个青年在村里几年了找不下爱人，进城当了警察沒三个月回村就找上了。青年男女有这个空气，当然也会引起其他人的思想問題，社干部是很恼火的。这个社前年培养了十三个會計、記工員，都是高小毕业生，現在只丢下一个了。老年人发愁說：“我們这一輩子是扛毛粪桶了，但我們总有个动弹不动的时候，国家不想个办法制住青年人，将来农村生产誰搞呀！想起这来，我們也动弹的沒劲啦。”話是这么說，但他家的青年，还是想办法要往城里打发；反对人家的姑娘不和他儿子結婚，可是他的姑娘也不愿意嫁給农民。

这两种情况，当然都是不利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因此，我們决定还是要在这个社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宣傳。

二、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根据省委的指示，我們这个試点的办法就是要搞思想运动，要在运动中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我們首先做了个启发报告，大意是說：我們的任务是要把我們的国家建設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国家，农村的任务，除了支援国家建設以外，主要是把自己的村庄建設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讲了講社会主义的远景好处，將我們搜集到的上述材料，进行了分析，对这些人进行了解釋和批判。

把高粱地里說的話摆在桌面上

然后，就以学习这个报告，联系实际进行討論。起初，以为暴露思想可不能那么順利，但是事实不是那样。这个报告好像是挑了馬蜂窝。十个生产队分十个攤子討論，一致的說法

是：这一次咱可得和他們見个“真”，把过去高粱地里說的話都摆到桌面上來吧！看看究竟是誰对誰不对。肚子里的話都說出來了。他們开始吵了半个多鐘头，然后坐下来，让人做记录，一条一条地說，又說了一个多鐘头，直到沒有新的問題才罢。

各队意見大体一样，主要是說：不能光說农民想往城市流，不安心生产，因为城市生活太好，农民生活太坏，誰不愿往好处走？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工人抬得太高，把农民压得太低，进了城市忘了农民，一样的人民两样看待，当家人有偏心。有些人說：“讓我們爱国啦，爱社啦，你們不爱我們，我們爱你們干啥！”

他們摆出了問題，就討論办法。起初，在火头上，他們的办法很簡單：降低工人工資，降低工业品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禁止青年人进城，取消对农民进城的許多限制，改进各方面的工作。他們認為这就是办法。有些人說：什么时候出上个青天大老爷，能替农民出这口气！有的說：这些問題，誰答复上一半也是包公！当时的情况是：反面意見占了上风，大吵大鬧，即使有些正面意見也插不上口。

在运动中，表現出我們工作上的缺点是：沒有按“先党内，后党外，先培养骨干，然后展开”的次序办事。因之，我們不得不补这一課。于是我們就找骨干、找积极分子，和他們先商量这些問題該如何解决，教育他們，使他們掌握武器。我們向他們介紹了一下底子。說全国粮食每人平均約六百斤；布生产不多，不可能每人都均四丈，两丈有的农民也买不起；工业品价格貴，是增加国家收入的方法之一；婚姻問題，只能婚姻自

主；青年人进城，要有計劃有組織，因为以后不能隨便吸收人。关于开会的方法，提議划分小組，开小型座談会，七八人一組，每个組有积极的，有一般的，也有思想情緒問題严重的，这样便于坐下来討論問題。

集中討論了这几个問題：工人工資高不高，該不該？粮食够吃不够吃？布票少怎么办？工业品价格能不能减？农产品价格能不能提？农民生活困难是不是因为負担和价格問題？改善生活的办法是什么？

不能閉着眼睛說工人生活就是好，农民生活就是苦

关于工人生活問題：有个在“經緯”厂做过临时工的人說：“你們听見工人一个月賺几十元就眼紅，这才是只見魚喝水，不見兩鰓漏，你們就不知道他們开支也大啊！‘經緯’的临时工一級工三十一元，二級工三十九元，三級工四十五元。全厂工人还平均不到三級。就以三級算吧：每月四十五元，房租三元，燒土五角，水費，电費，倒灰渣，还得出錢，連吃在內一个人一月总得十元，一家四口，四十元，一年剩下六十元，不穿啦？”一个一家四口人的农民也算了算他的：去年二百个劳动日，收入二百四十元，口粮分了一千八百斤，扣一百四十元，下余一百元，煤油四元，燒煤二十四元，除了吃盐、买火柴、打醋，也是留下五、六十元。他說“我也沒打穿衣服呀！”有人說：“經緯厂工人上海、广州人多，从那里来咱这小地方，收入少了誰来，多点可以。”有人說：还有，人家技术高，咱社买了一輛汽車，雇工人一月七十元，給你一百元你能开了？有人說：技术活咱干不了，拉平車、做杂工总行，这些人工資也不低啊！有人說：你沒听报告，說拉平車工資高，是工作上出了点

偏向，你現在去試試，看還能賺上賺不上？怀仁的胶皮車还歇回来。杂工的工資高，是有点高，政府正考虑这个問題哩。有人說：杂工的工資也不能減的比农民少了，不見去年，調你們誰去誰也不去。有人說：反正不能閉着眼說工人生活就是好，农民生活就是苦。按劳取酬，这社会，誰的劳力多，人口少，誰就过得好，相反誰就过的困难些，工人干部不是也提倡避孕？生活困难了，工人的孩子也得給人。有人說：說人家劳动輕、条件好，人家是七天一个星期，咱休息起来連住歇。咱村有人不是剛从富家滩回来，問問他工人劳动輕不輕，条件好不好？好，他回来干啥？隔行如隔山，不念那家書不識那家字。有人說，农民和工人的收入也不好比，农业社生产干得好，就分得多，減产了就分得少，不能让人家工人跟上农民跑啊！比如去年咱們減产分的一元二，今年計劃是两元四，如果按前年中常年景說，还分一元七，也不能光以減产时来比較啊！况且村和村还不一样，有的不如咱，有的比咱还高，东赵一个劳动日就分三元多，你說該和誰比呢？让咱当家，也下不了决心，究竟該給工人多少工資。各方面的情况都得考虑到啊！

当面算了几戶，家家的粮食够吃，都笑起来了

另一个小組討論的是要下工人的工資。有的主張下一半，有的主張八折，也有的主張九折。討論半天總結是下不得。有人說：工人工資少了不如农民，人家不干，农民也沒人愿去，象去年发生过的情況，那我們还要工业不要？有个青年人說：不要。一个老年人說：青年人，尽說风凉話，就不好好考虑考虑，比如晋华紡織厂工人不干，咱一不会紡花，二不会織布，我看你露着屁股怎么出門呀？有的人說：下不得，他們不愿干

回来农村，添些人还不是要平分咱們的，那是下咱的收入呢，还是下工人的收入呢？有人說：你这家伙老是自私自利，各人干各人的，人家劳动人家就能生产，分着你的啦？有人說：不要說这啦！你們沒看过报纸，英法侵略埃及，苏联一說出兵，就吓的他們不敢打啦，沒工业行不行？亡国奴咱还没有当够，日本人才打走几年，倒忘了人家欺侮咱啦！关于粮食問題和布票問題：开始这个說三百八十斤不够，那个說六百斤也不够，还有个青年人說一千斤不够他吃。另一个人火了說：“討論問題嘛，总是說二話，咱們誰是三百八十斤，除五保戶三百八十斤以外，誰還不在四百斤以上，咱計算一下，誰家的粮食吃不到收夏。”挨住当面算了几戶，家家够吃，都笑起来了。有的說：不要笑了，接夏天么，够吃了，可是年年这样，打下麦吃麦，打秋吃秋，倒不轉，就沒个办法，誰家能倒轉了。又有人說：四百斤里边，有三十斤豆子是頂油，要不就是国家供油，要不就是粮食不够吃，咱这地方不比別处，油料就是豆，粮食也是豆，国家要不給咱留点油料，混在粮食里，可是不行啊！有的說：听說咱全国每人才平均六百斤粮食，种子、油、酒料、飼粮什么也在里头，你們說咱能吃多少，咱吃多了，餓了別人，反正就是那点儿粮食，不从生产上想办法增产，誰也沒有好办法。有的反駁，要少就都少，工人为什么吃的多？有人說：你光听說他們吃六十斤，那是最多的，就以最多的說，他也是一个大人分那么多，城里人粮食供应和咱不一样，咱是大小人平均，人家是大小人、劳动輕重都不同。

一个組，當場替駐社干部、青年团榆次县委副書記算了一下，这个同志一家四口人，都在城里，夫妇两个大人，两个孩

子，每月供应八十五斤，折粗粮一百一十斤，全年一千三百二十斤，平均每人三百三十斤。張庆村五保戶还平均三百八十斤。这样一算，大家不哼气了。有人又想起来說工人吃的好，白面大米，咱們农民的嘴就不是嘴？有人說：你来当个家，想想該怎么办？晋南是产麦区，农民一天三頓面，人家的农民出来，一月吃上十几斤面，你說有意見沒有？你不要光看咱張庆村，工人又不是一个村的人。就拿大米來說：“經緯”的上海、广东人，就是爱吃大米，白面还吃不慣呢。咱們覺得大米好，但是总不如白面好，可是他非吃大米不行，就不爱吃白面。一处乡土，一处风俗，你当这个当家人，我看你怎么办啊！有人說：粮食咱們沒意見了，咱們說布票問題吧。到底是誰費布？有人回答說：你过去沒听工作同志講过，給农民布票多了，你也买不起。有人說：你說張庆誰家买不起？有人說：天下光咱張庆？不如咱村的地方多呢！两丈布就是还有买不起的。有人說：买不起是他錢少，工人就都能买起了？有人說：你沒听报告，干部和工人不过两千多万人，农民有五亿，你把他們減了，我看你也分不到几寸。

工业品价格能不能減？农产品价格能不能提？

关于物价問題：原来大家的情緒很大，总觉得吃亏太大，但討論中也基本上解决了这个問題。有人說：提高粮价，別的都提起来怎么办？結果还是和不提一样，可不要提这个意見。有的說：你說的工业品价格都提了，粮价怎么也沒跟上漲起来，价格还不是由国家掌握。有人說：做什也得吃粮，粮价漲了，你說他漲不漲，不漲国家就要减少收入。有人說：工业品价格降降就行，粮价不漲也行。有人說：工业品貴賤都是国家

的，賺也是國家，賠也是國家，這裡賺，那裡賠。你沒聽說，咱們拖拉機站就賠錢，要不賺上些，從那裡來補賠錢買賣？有的說：咱村還有氣象站，還有中學哩，那都不是國家花錢？有的說：這話有道理，聽說從城里往咱村接有線廣播和電話，就得幾萬元錢，不賺上些能給你白接起來，叫你聽廣播？有的說：那負擔（農業稅）干了甚啦？有的說：一樣，負擔也是國家收入，賺下錢也是國家收入，光負擔够甚，咱張慶的負擔，還不够咱村開支，不要建設工廠啦？有的說：我看這辦法（一部分物價貴一些）比增加負擔強，這是誰买东西誰負擔。你要喝酒，就讓你多負擔些，別說一元錢一斤，兩元錢一斤也不貴。但是，對因為管理不善造成成本過高，和自由市場上許多種物品沒有市價，由賣的人亂漲的情況，大家都認為應該改善。

三、在“吵過”的基礎上作總結

“過去肚里結的一塊冰，現在給沖消啦！”

就這樣在小組里，你一言，我一語，基本上吵通了。在這個基礎上做了總結。

總結的大意是這樣：合理的、能辦到的意見，可以接受，告訴大家說可以考慮、改變，或向上級反映。如：供銷社和手工業社的經營、勞動問題，工廠的管理經營問題，油料留量問題，糧食加工業集中城市的問題，城市里對農村大車、自行車、拉糞車的管理問題，物價管理問題，糧食壓級問題。由於農民不了解全面情況，或不了解規定某些具體政策的意義，因而引起的糊塗思想和誤解，就加以解釋。如：工業品價格問

題，城市糧食供應問題，工人工資問題，布票問題。有些要求現在不能解決，有些要求在社會主義階段也不能解決，就說清楚。現在不能解決的問題有：勞保福利，人口多生活困難，富裕中農收入減少。社會主義階段也不能解決的問題有：城市與鄉村的差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在按勞取酬時期，富裕一點和比較不富裕一點的差別。不對的意見要批評。比如有的要求勞動條件完全相同，有的要求生活條件絕對平均。難辦的是：老年人要求禁止青年人進城；青年人要求禁止婦女嫁到城里。向大家解釋婚姻政策，說對於青年流進城市可設法予以限制，以免盲目，並由青年團、婦聯會今後在這方面做些工作。對實際問題設法加以解決。一切都歸到生產上來。農民說分配不公；幹部說根本問題是東西少，不公雖有，但不是主要的，也不是根本的。糧食，布等問題，都是如此。婚姻問題雖未解決得好，但思想問題也解決了。群眾的情緒高漲，說：“燈不撥不明，話不說不透。”“說透了，就痛快啦。”“過去肚里結的一塊冰，現在給沖消啦！”“這才叫擴大民主生活，以後有問題提到當面，眾人是聖人。”

這次運動是利用半個月的晚上的時間進行的，基本上是成功的，教育了農民，也提高了幹部（過去幹部對群眾的意見不是壓，就是不敢招架），大大推動了當前生產行動，社員們和幹部的情感也親密起來了。

必須相信群众，必須加强領導

山西和順白泉乡开展两条道路大辯論的經驗

如何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辯論，解决农民思想問題，提高农民政治覺悟？山西省和順县白泉乡提供了成功的經驗。白泉乡的經驗說明：开展大辯論的中心問題是領導上走群众路綫的問題；必須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开展自由爭論，在“放透、吵通”的基础上，总结起来进行正面的教育。同时，要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迅速果断地处理实际問題，从行动上启发群众教育群众。

白泉乡开展大辯論，是中共和順县委直接派工作组指导进行的。这次辯論共进行了一个月時間（5月中旬到6月中旬）。从运动的实际效果来考察，是成功的。

摸清思想，培养骨干

白泉乡晋华农业社是和順县的一般社。全社二百二十七戶，去年遭了大灾，但粮食还能自給自足，每人平均分了三百七十多斤，最多的五百多斤。社員生活較好的七十一戶，占总戶数的31%；有粮吃缺零花錢的一百二十五戶，占53%多；劳力少、人口多或因病殘生活困难的三十四戶，占15%。社員的政治思想情况，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真誠拥护农业社的一百二十八戶，占全社总戶数的56.3%；基本上拥护合作社制度，

但有分歧意見的八十五戶，占37.4%多；對社不滿并有嚴重消極抵觸情緒的十四戶，占6.2%。愛社如家、勞動積極的絕大部分是貧農或下中農，對社不滿和消極怠工的多數是地主富農和某些富裕農民。但是，在農民各階層社員中，都有一些社員對國家、對社會主義制度、對合作社、對領導幹部有不同程度的不滿情緒。

工作組了解上述情況以後，根據毛主席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精神，動員農民群眾大鳴大放。首先交代黨的方針，解除幹部怕挨整，農民怕惹人、怕扣帽子、怕不解決問題等顧慮，啟發他們毫無顧慮地提出意見，暴露真實思想。為了使運動順利開展，工作組開始就注意培養骨幹。首先在黨員、團員和非黨積極分子中，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帶頭鳴放，並且初步分析矛盾。然後，由骨幹分子深入田間、家庭，串連訪問，個別談心，根據男女老少不同對象分別動員。鳴放開始後，先開青年、婦女、榮譽軍人和轉業軍人等小型座談會，讓他們提出意見，作初步討論。這樣做，全社幾天之內就提出一百零五條意見，涉及個人和國家關係、工農關係、個人和集體、領導和群眾、以及農民之間關係等問題。內容範圍很廣，加上各人的說法和認識程度上的差異，更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因此，如何引導農民開展自由爭論，達到辨明是非，提高認識，是頗費思索的問題。

發揚民主，放透吵遍

問題提出來了，群眾的情緒集中在要求解決問題上。他們說：“氣是放透了，就看怎麼解決吧！”當時，反面意見占了上

风，正派的党员干部有消极悲观情绪，甚至有“咱下台，给你们干干看”的念头。这时，工作组召开党支部委员会会议，把群众所提的意见，逐条研究，分清是非性质。经过研究，大家明白在一百零五条意见中：一类属于群众认识模糊或误解，占66.6%；一类属于领导作风或确实存在的具体问题，急待解决，占33%多。会议决定解决的办法是，思想问题从思想上解决，领导问题主动作检讨，能解决的立即解决。接着，又召开了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介绍鸣放的底子，共同商量解决办法，使他们认识统一，掌握辩论武器。最后，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思想问题：第一、农民生活苦不苦，比什么苦？苦在什么地方？要想不苦怎么办？第二、农业合作化好不好？合作社制住了那些人？制住好不好？不制住行不行？第三、要不要领导？没领导行不行？为什么领导总是说群众？群众总是埋怨领导？领导有没有困难？会不会犯错误？合作社的缺点是否光怨领导的过？这三个问题，以生产队为单位，放下去让群众争论。

争论开始，对于农民生活比苏联苦、比将来苦，这是大家早就肯定了的。但现在到底苦不苦呢？许多人表示“难说”。有的人不同意现在苦，但嘴上讲不出个道理来。解答这个问题的是一些久经风霜的老年农民。他们以亲身经历对青年人说：“以我看，现在生活好过的多了。过去平日吃糠咽菜，过年过节也不吃净粮食，更不用讲零花钱了。现在呢，一天三顿粮食面，两天一顿饅头，还讲究穿戴，下雨天有多少人脚上穿胶皮鞋！”老农责备说生活苦的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但青年们还不服气，又提出：没有零花钱，吃的也不香甜，这不苦吗？这种说法一出口，当即有人举出事实驳倒，事实说明现在的青年是农村享